

结伴不结盟,中俄关系应让西方开眼

中俄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昨天正式启动。此次由俄方牵头组织的联合军演共聚集9艘水面舰艇,主要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行的安全。莫斯科胜利日大阅兵刚刚落幕,中俄走近备受关注。地中海的演习延续了世界舆论对中俄关系的聚焦,一些很不靠谱的评论在西方媒体里跃然纸上。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说出了“俄中轴心再次成为西方和平繁荣国际关系愿景主要威胁”的极端话语,从中俄的角度看,这种评论背后的心态十分奇怪。中俄反复表示“结伴不结盟”,除了心智有问题者,西方人都应该听懂了。

中俄成为战略伙伴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它有别于美日同盟等当今世界的所有军事同盟,也是一目了然的。西方应当当心自问是不是对中俄做了什么重要的亏心事,以至于它们看到中俄

走近就如此不安。

中俄“结伴”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它不仅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还同时增加了中俄各自的安全感,有助于维护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中俄战略合作对两国复兴都构成不充分的外部环境条件,两国都不愿意因为“得到了对方”,而“失去了世界”。

此外中俄不具备结成盟国的一些基本条件。两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差距很大,中国是亚洲国家,俄罗斯则是欧亚特性,而且是欧洲特性比较强的国家。中俄是完全平等的两个大国,不是美日那样的“主仆关系”,平等而差异很大的两个国家除非面临生死抉择,很难结盟。

中俄双方在地缘上相邻,历史告诉

我们,两大强邻难免有一些自然的戒备,结盟不如结伴。中苏当年结过盟,但那次结盟的教训同后来两国敌对的教训一样深刻。纵观始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莫斯科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国人真心认为今天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历史上最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俄罗斯人大概有同样的认识。

对中俄关系的复杂议论在两国内部也有。1991年俄罗斯就选择了西方式制度,虽然实际运行时权力中心比较突出,但制度上已经西化。中国已经市场化多年,社会也有多元意见。在中俄各自国内都能听到主张警惕对方的声音,构成了围绕中俄战略合作关系又一层舆论上的复杂性。

但必须指出,支持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十分强大的主流意见,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担忧和以西方为源

头的幻想根本动摇不了两国关系的稳定。自中俄关系正常化后,历代中俄领导人也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这超越了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和政治理念,也超越了两国各种局部和临时性利益带来的影响。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十分发达,但我们不能不说,过度自信和自我中心感限制了西方精英的视野,他们现在应该抬起头来好好看看世界了。

中俄的“结伴不结盟”打破了西方对大国关系的传统认识,是让西方人开眼的21世纪大国关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各种同盟正在这个时代变味发霉,一些西方人闻惯了那种臭气,不知道国际关系中还有清新存在。但我们希望,他们的这种政治嗅觉能够恢复。▲

大国国际秩序观既要好听还得好用

阎学通

区分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

英国带头突破、美国阻碍参加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使国际秩序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国际秩序研究的“大跃进”似乎要来临,很多单位建立智库要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然而,研究国际秩序问题首先要明确国际秩序是什么?“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全球治理”四者相关联,但它们性质不同。区分这四个国际事务的不同是分析国际秩序变化趋势的前提。

“国际秩序”是由权力分配、国际规范和国际机构三者构成的。权力分配在当今主要是指规则制定权的大小,国际规范是指对国际行为约束的规则,国际机构是执行国际规范的组织体系。研究国际秩序变化主要是分析这三要素的变化趋势。人类社会秩序与自然界秩序的重大区别之一,前者是指客观社会与主观目的或价值标准相一致的状态,而后者则指规律性的运动,与人的主观目的无关。例如,图书馆的书按类别摆放就是有序,按簿厚摆放就是没有秩序,而地球围着太阳转只要有规律,无论向何方转都是有序。“国际秩序”就是指国际社会现状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或价值标准一样的状态。

由于主导国家和非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是不同的,于是主导国所建立起来的秩序难以得到非主导国的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际媒体不将冷战后美国发动战争的行为视为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但却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挑战了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由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是判断国际社会是否有秩序的重要标准,因此有了中国要提出自己“国际秩序观”的问题。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不同,它是指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与人的主观认识无关。

国际体系由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行为体三者构成。例如,冷战体系是两极格局、霸权规范和主权国家为主的行为体。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国际规范和行为体并无质的变化,因此国际体系依旧。无论各国如何认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都只能在客观的国际体系内互动。由于国际体系是指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因此没有“国际体系观”的问题。

“国际格局”是指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相结合的国际政治实力结构。它是国际秩序中权力分配的基础,但它并不等于权力分配。例如,冷战时期,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美苏分别拥有东西方地缘政治主导权。现在的两极化趋势很可能形成新的两极格局,但在新两极格局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权力分配将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权力分配。未来国际主导权的分配将很可能不是地缘性的而是领域性的。我国双重领导或双首长制作比喻,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中,中美主导权的分配将是不一致的。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是责任分配和权力分配之别。“全球治理”是指世界各国承担参加集体行动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各国承担责任的多少不是以权力大小为基础的,而是以实力大小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权力与责任之间发生背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即权力大的国家不必然承担比权力小的国家更多责任。在防止温室效应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治理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了国际秩序并不必然就能进行全球治理,这如同避免了战争并不等于就能控制住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应谨慎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

崛起大国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是个常见现象。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世界政府的国际秩序观,二战结束前美

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建立联合国的国际秩序观,苏联提出共产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今天中国崛起加速,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无可厚非,但需要谨慎。

研究中国应提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应汲取历史经验。威尔逊提出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无果而终。200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许多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也未能影响国际秩序标准的改变。然而上世纪50年代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判断标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各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不同的。推行本国的国际秩序观需要特别慎重。搞不好就会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美国推广其国际秩序观的做法视为霸权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认为,通过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来改变国家权力关系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冷战历史表明,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不同,且两极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提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避免重回冷战是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国际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权力将减少,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本质又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向世界提供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其他国家会从正面理解我国不寻求世界主导权的善意,还是从反面认为我国渴望国际权力,是一个需要慎重评估的工作。新中国的历史表明,极左和极右的思想观念都对国家有害,但极左思想造成的历史灾难远远大于极右思想。如何避免极左思想对我国国际秩序观的负面影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国际论坛版文章除社评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taolun@globaltimes.com.cn

近几年来,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呈现出地缘政治急剧动荡的发展态势,并突出表现为欧洲、中东和亚太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持续紧张,当前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均与此密切相关。

在欧洲,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加剧导致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持续紧张,并被视为“地缘政治回归”和“新冷战”爆发的突出标志;在中东,以“代理人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不断加剧;在亚太,朝鲜半岛、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呈群体性紧张态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地缘板块同时紧张,固然与这些地区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其地缘政治紧张均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美国重拾地缘政治遗祸世界

刘中民

在欧洲地区,多年来美国在军事上推行北约东扩,在政治上大搞“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最大受害者是俄罗斯和欧洲,美国则可以坐收阻遏俄崛起步伐和削弱欧洲的双重目的。在中东地区,美国一方面谋求通过撤军脱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沼,另一方面又不负责任地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事务,其结果是中东局势失控,地区大国竞逐地区主导权和恐怖极端势力异军突起并存的失序状态。在亚太地区,美国以所谓“再平衡”战略为抓手,通过推行TPP,强化同盟关系,加大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深度介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这不仅导致半岛问题、中日关系、东海和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不断升温,而且使东亚地区呈现出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与小国中渔利、推波助澜并存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美国之所以推行加剧欧洲、中东、亚太地缘政治紧张的战略,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兴起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战略焦虑。为延缓霸权衰落,美国便重拾地缘政治这一西方驾轻就熟的传统战略工具,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态势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和西方深信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于“均势”,这是西方一直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以均势为基础的“百年和平”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布热津

斯基等美国战略家设计欧亚“大棋局”的基础所在。但他们却往往忽视了拿破仑战争后“百年和平”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恰恰构成了孕育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沃土。

美国挑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紧张将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首先,在国际体系层面将出现地缘政治不断挑战全球治理的复杂局面。当前,由于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世界政治出现地缘政治范式和全球治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则不断遭到前者的挑战和蚕食。目前,全球治理在贸易、金融、环境、安全等领域举步维艰,联合国改革和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不前、气候变化谈判异常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地缘政治回归导致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合作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全球治理受到碎片化的

区域治理挤压,导致全球治理的地缘政治化。目前,美国已经置自身创建的许多国际制度于不顾。例如,如果美国在欧洲推行的TTIP和在亚太推行的TPP获得成功,WTO这一美国创立的国际贸易多边机制将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新兴国家如金砖国家在继续谋求改革现行国际制度的同时,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这势必导致全球治理的区域化和碎片化。

最后,地缘政治回归导致的大国“新冷战”危险,“文明冲突”加剧,局部冲突频发,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军备竞赛加剧等政治、安全和军事风险不断扩大,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作为国际制度创立者和全球治理的倡议者,其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能力均出现根本性的危机;而更大的悲剧是美国逆全球治理潮流而动,不在自身治理能力建设上进行反思和改革,而是重拾地缘政治的故伎延缓霸权衰落,这或许是所有霸权最终都无法逃避的悲剧。但是,对于今天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而言,这种悲剧就不仅是霸权的悲剧,也将是世界的悲剧。▲(作者是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